

# 视觉抗争：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与符号矩阵

刘 涛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在转型时期的诸多抗争形式中,“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 resistance)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抗争剧目(repertoires)。如果将表演式抗争视为一个“事件文本”,符号矩阵无疑在叙事学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模型,即可以借助符号矩阵(semiotic matrix)所揭示的语义结构来把握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情节构成和行动框架。符号矩阵不仅发现并确认了图像在社会事件中的“行动元”角色与功能,并且在结构主义框架中证实了图像对于事件推进的动力作用。因此,表演式抗争本质上是一种“图像事件”(image events),而底层抗争的符号学本质则体现为视觉抗争(visual resistance)。

[关键词] 表演式抗争;视觉抗争;剧目;符号矩阵;图像事件

[中图分类号] G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6)04-0005-11

[DOI] 10.16783/j.cnki.nwnus.2016.04.001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景观中,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抗争形态——表演式抗争(performing resistance)。学者黄振辉较早提出了“表演式抗争”这一概念,并从学理上阐释了其不同于其他抗争形式的特征和内涵。<sup>[1]</sup>不同于传统抗争谱系中的“依法抗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死抗争”、“以气抗争”,表演式抗争不单单在政治景观上意味着一种新的抗争形式,同时在抗争观念上指向一种新的解释机制。所谓表演式抗争,旨在强调一种崭新的抗争形式和实践形态,即通过制造某种戏剧化的、消费性的、参与性的表演行为来传递并表达抗争诉求的一种底层行动方案和政治实践。

我们不妨看看近些年正在兴起并呈现普遍蔓延之势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表演式抗争事件:为了追讨工程欠款,女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维权;大学生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未果,特意向广州市发改委赠送带刺的皮球;5名妇女跪在河南开封府门前向“包公”递交状纸,为无辜羁押的家人申

冤;7名访民在中国青年报社门口集体“喝农药”,希望得到媒体声援;13名孩子举着“我要上学,还我父母血汗钱”标语,跪在云南大理的开发商门前,帮父母讨薪;广东农民为反抗拆迁在灶台上“煮锄头”,意为“鸟尽弓藏,田尽锄头亡”;新购买的装载机存在质量缺陷,湖南农民维权未果,为装载机和豆腐举行另类“婚礼”;河南七旬老人在庙里供奉县长像,跪求讨要医药费;长沙市民投诉无门,给政府赠送“踢皮球先进单位”锦旗;重庆男子新买的手机出现故障,抬着花圈来商场门口,祭奠自己“死去的手机”……

纵观以上有关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及其抗争手段,它们遵循着某种普遍共享的“剧本”结构和特征:第一,在抗争规模上,体现为个体的或小范围的抗争行为,并非群体性的社会抗争;第二,在抗争方式上,体现为一种相对幽默的、趣味性的戏剧表演行为,而非直接的暴力对抗;第三,在抗争目的上,表演的功能是为了制造图像事件,以此作用

[收稿日期] 2016-05-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特点、机制和理论研究”(15ZDB14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视觉修辞的意义生产机制及典型案例库建设研究”(12JHQ056)

[作者简介] 刘涛(1981—),男,甘肃庆阳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环境传播、视觉修辞、媒介文化研究

于公众的情感认同领域，进而通过视觉化的动员方式形成舆论压力。按照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观点，如果“不同的事件分享着共同的剧本”，<sup>[2]</sup>（P 40）并且以一种模式化的方式被反复招募、挪用并演绎，那这类事件便可以抽象并提炼为一种新的抗争剧目（contentious politics）。

抗争剧目是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在研究“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时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概念，主要指“为某些政治行动者内部当时所知晓且可用的一批抗争表演。”<sup>[3]</sup>（P18）简单来说，抗争剧目就是个体或集体行动中所采用的抗争形式和行动方案。查尔斯·蒂利给出了18世纪以来流传至今的抗争剧目清单——聚集、罢工、选举集会、示威活动、请愿游行、组织起义、占领公共场所、冲击官方集会、发起社会运动等，并坚持认为这些经典的剧目构成了19世纪以来“大众斗争的主导形式”。<sup>[2]</sup>（P62）人类抗争史不断证明：“当一种斗争表演获得了明显成效时，它就成了未来表演的可资利用的范本。”<sup>[3]</sup>（P56）显然，相对于其他抗争形式，表演式抗争形态重新定义并拓展了“抗争政治”的剧目形式，因此意味着一种新的抗争剧目。不得不说，表演式抗争之所以没有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的暴力方式，根本上是源于对转型时期“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sup>①</sup>的微妙回应和特殊表达。

作为一种相对模式化的剧目，必然共享着某种相对比较稳定的“剧本”结构，表演式抗争同样意味着一种抗争叙事文本。在表演式抗争叙事中，存在诸多相互关联的戏剧要素，包括行为主体（如弱势群体、权力对象、社会公众）、文本形式（如语言文本、图像文本）、空间形态（如线下表演空间、线上争议空间）、话语观念（如权利话语、公平话语、法制话语、和谐话语）、符号资源（如花圈、开封府、关公庙、带刺的皮球）、文化仪式（如下跪、娶亲、祭祀、喝农药、新闻发布会）。正是通过对这些剧目要素的有效组织和编排，“抗争性话语”（insurgent discourse）<sup>[4]</sup>（P59）以一种相对安全的方式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从叙事学意义上把握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抗争文本的叙事结构和底层语法，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表演式抗争之所以存在并发生的宏观语境。接下来我们立足于符号矩阵的相关思想和分析

方法，重点探讨表演式抗争剧目的要素关系、情节构成和行动框架，一方面尝试提供一套有关表演式抗争叙事的分析模型，另一方面尝试对表演式抗争作为“图像事件”的符号学本质进行理论阐述。<sup>②</sup>

## 一、符号矩阵的基本思想与分析方法

法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格雷马斯致力于探索文本的叙事语法，它在《论意义》中提出了文本语法分析的四个流程：语言表达（组织、连接）、话语结构（角色、母题、形象）、叙述结构（基础语法和表层语法）、深层结构（符号矩阵）。在这个流程体系中，格雷马斯特别强调了其对语义结构的情有独钟，认为语义结构是接近文本叙事原理的元语言路径，而符号矩阵则是他提出的抵达叙事语法“深层结构”的一种符号学分析模型。所谓语义结构，强调“具有社会性和个体性（文化或个性）的、不同语义域的——给定的或仅仅是可能的——一般组织形式。”<sup>[5]</sup>（P36）格雷马斯眼中的语义结构不是一种科学形式，而是一种符号学形式：“科学结构表述人所谓的‘现存’世界，语义结构把这个世界投影为存在的和有意义的世界，亦即语义世界，在这两种表现之间，我们不可能建立连续性，只可能进行一系列代码转换操作。”<sup>[5]</sup>（PP. 43—44）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科学结构和符号学结构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系统。科学形式面向自然世界，而符号学形式面向人类世界，只要掌握了科学形式和符号学形式之间的代码转换规则，便可以实现两套认知形式之间的关联和对接。<sup>③</sup>

为了探究通往语义结构的代码操作法则，格雷马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符号矩阵分析结构，并认为其是“关于世界之表达层面的符号学形式”。<sup>[5]</sup>（P43）之所以提出符号矩阵，格雷马斯的思路非常清晰，那就是“把语义结构整合进一个一般认识论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世界被设想成分解的实体，实体通过不同类型的语言逐步得到描写。”<sup>[5]</sup>（PP. 42—43）从符号矩阵诞生的那一天起，格雷马斯便予以高度重视，他通过《结构语义学》和《论意义》将符号矩阵推向了相当重要的符号学地位，并将其视为把握语义结构的一种普遍的、底层的、基础的分析方法和结构模型。格雷马斯甚至断言：“所有的语义域（‘观念’、‘场’、‘概念’、‘区域’、‘领域’等），被我们链接成某种关系、设定为语义轴的语义域，都可以通过符号学矩阵得到表

述。”<sup>[6]</sup> (P94)

符号矩阵是在二元对立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分析结构。格雷马斯认为，任何意义都存在一个普遍结构，而这个结构可以通过矩阵的形式进行描述。符号矩阵揭示的是一种关系结构。格雷马斯早在《结构语义学》中就已经提出通过“语义轴”来构想一种最基本的关系结构。一个语义轴可以接合 (articulation) 两个义素 (即意义成分)，形成义素范畴，这便铺设了一种最基本的线性关系结构。所谓结构，主要指“意义的存在方式，其特征是两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的显示”。<sup>[7]</sup> (P36) 当两个义素在语义轴上建立关系，语义轴便意味着一种义素范畴，“一方面表示出两个关系项，另一方面显示出关系的语义内容。”<sup>[7]</sup> (P25) 在符号矩阵中，一般存在四个义素，相应地也就构成了多种结构维度，即四个义素之间的接合关系，其中语义轴是最根本的结构维度，一定意义上主导并决定了其他结构维度的性质、状态和意义内容。

在符号矩阵中，如果一个义素  $S_1$  确立，那同时存在  $S_1$  的对立项  $S_2$ 。 $S_1$  和  $S_2$  构成了一条语义轴，且是绝对的对立关系或反义关系。这一语义轴铺设了意义的基本结构，同时也决定了矩阵的意义系统。可以说，把握符号矩阵的关系结构和属性特征，首要的任务就是对  $S_1$  和  $S_2$  的义素识别和对立关系确认。与此同时， $S_1$  和  $S_2$  分别存在各自的矛盾项  $\bar{S}_1$  和  $\bar{S}_2$ 。 $S_1$  和  $\bar{S}_1$  是相互矛盾的， $S_2$  和  $\bar{S}_2$  也是相互矛盾的。如此一来，按照顺时针方向，矩阵的四个原点的义素分别是  $S_1$ 、 $S_2$ 、 $\bar{S}_1$ 、 $\bar{S}_2$ 。在这一符号矩阵中 (见图 1)，存在三种关系结构维度和三种关系形态：第一是语义轴上的反义关系 (义素结构为  $S_1+S_2$ ， $\bar{S}_1+\bar{S}_2$ )，即二者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尤其在价值维度上是相反的；第二是对角轴上的矛盾关系 (义素结构为  $S_1+\bar{S}_1$ ， $S_2+\bar{S}_2$ )，即二者之间是一种朴素的否定关系，存在于一个矛盾结构中；第三是指示轴上的蕴涵关系 (义素结构为  $S_1+\bar{S}_2$ ， $S_2+\bar{S}_1$ )，即强调二者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意指范畴，存在特定的包含、对应或指涉关系。举例来说，假如  $S_1$  是黑，那  $S_2$  便是白， $\bar{S}_1$  是非黑， $\bar{S}_2$  是非白，四个义素之间存在反义、矛盾、蕴涵三种关系，对应的矩阵结构如图 1 所示。格雷马斯进一步指出，在符号矩阵中，只要确立其中一个义素，那其他三个义素便可以按照反义、矛盾、蕴涵的关系推导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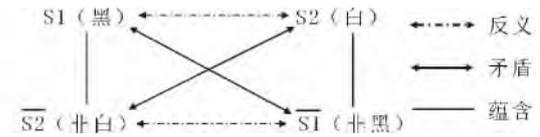


图 1 符号矩阵的基本结构

可见，符号矩阵分析的基本思路是，在一个既定的文本系统中，通过对四个义素 (如人物) 的识别和确认，可以发现义素的属性状态及其之间的对应关系。可见，如果一个符号矩阵能够建立起来，我们便可以“阐明获得意义的条件，从中推出意义的基本结构，然后把该结构当作一套公理系统”，从而“阐明意义在微观语义域中最初的分解”。<sup>[5]</sup> (PP. 168—169) 因此，符号矩阵揭示了有关意义的基本结构，通过分析符号矩阵模型中义素的位置和关系，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把握义素之间的关系结构和接合方式。换言之，意义并不是来自语言符号本身的限定性和规约性，而是由它所在符号矩阵中的位置及其所处的结构性维度 (语义轴、对角轴、指示轴) 确定的。正因为符号矩阵能够相对清晰地揭示义素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因此成为结构主义叙事分析中极为常见的一种分析模型。

## 二、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与符号矩阵

如果我们将表演式抗争视为一种媒介文本，如何从叙事学意义上认识文本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的叙事关系，符号矩阵无疑提供了一种普遍的叙事模型和分析结构。开展符号矩阵分析的关键是发现叙事系统中的四个核心要素，并确立其在矩阵结构中的位置。然而，借助符号矩阵来把握表演式抗争的叙事实践，真正的难点却在于，符号矩阵中的反义关系、矛盾关系、蕴涵关系把握起来相对比较抽象，这无疑为符号矩阵的要素识别及其位置关系确认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不得不说，尽管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被广泛地运用于相关的文本结构分析实践中，但却存在大量的生搬硬套甚至滥用现象。<sup>[8]</sup> 因此，为了比较容易地把握矩阵中的四个要素及其位置关系，本文尝试将符号矩阵与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的“行动元模型”进行必要的结合，重新界定符号矩阵中各个要素的指涉内容及其释义系统，进而以一种新的认知视角来把握符号矩阵中的要素构成。

### 1. 重构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

行动元模型是在分析俄国民间童话小说的基础

上发现的一种普遍的分析结构，其中包括六个行动元（actant），分别是主体/客体、辅助者/反对者、发出者/接受者。六个行动元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整个模型以主体所追求的愿望对象（客体）为轴；作为交际的内容（客体），愿望对象位于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之间，而主体的愿望投射于辅助者和反对者。”<sup>[7]</sup>（P246）在一个戏剧结构中，“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域结构”。<sup>[7]</sup>（P257）因此，主体对客体的欲求关系搭建了整个叙事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动力形态。如果说符号矩阵中的核心语义轴是S1和S2构成的反义关系，行动元模型中的核心语义轴则是主体（行动者）对客体（欲望对象）的欲求关系。不得不说，符号矩阵中的要素及其关系确立相对比较抽象，尤其是四个要素的意义难以把握，而行动元模型则比较清晰而简单地揭示了每个行动元的意义内涵和指涉范畴。鉴于此，本文回到表演式抗争的具体文本语境中，将符号矩阵和行动元模型进行有效的对接和糅合，即通过发现两个理论模型在要素构成上的关联性，尤其是从行动元模型中的要素意义及其逻辑关系来推演符号矩阵中的要素意涵及其位置关系，以此把握并确认表演式抗争剧目的要素关系及其行动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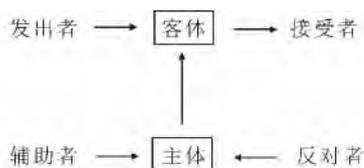


图2 行动元模型的基本结构

具体来说，符号矩阵中居于关键地位的语义轴是S1和 $\overline{S1}$ 构成的矛盾关系，而行动元模型中核心结构是“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欲求关系，二者在本质上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和对应性。在符号矩阵中，S1和 $\overline{S1}$ 往往作为一对矛盾体存在，叙事冲突主体上是在这一关系结构中编织和演绎的，因而铺设了叙事推进的基本动力；在行动元模型中，“主体”对“客体”的欲求关系构成了整个情节演进的基本框架。可见，如果我们从行动元模型维度来审视符号矩阵，S1对应的是“主体”，S2对应的是“反对者”， $\overline{S1}$ 对应的是“客体”， $\overline{S2}$ 对应的是“辅助者”。“主体”与“反对者”、“主体”和“客体”、“主体”和“辅助者”之间的关系分别是反义关系、矛盾关系、蕴涵关系，基本上符合符号

矩阵中义素之间的三种关系形态。因此，我们不妨对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重新赋值，也就是将矩阵中四个义素视为四种相应的行动元。如此一来，对叙事文本进行符号矩阵分析，便可以相对直观地确定矩阵中的四个义素及其位置关系。

## 2. 符号矩阵的要素识别与剧目关系

基于这一融入了行动元思想的全新的符号矩阵模型，表演式抗争实践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叙事关系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来了。表演式抗争的行动过程可以简单概括为：原本属于弱势群体的物质利益被权力阶层有意占用，在维权策略上，弱势群体通过戏剧化的表演方式制造图像事件，以此汇聚公众注意力，形成舆论压力，从而迫使权力阶层正视自身的利益诉求。可见，按照符号矩阵思想，S1和S2所构成的核心语义轴相对比较容易识别：表演式抗争事件中最基本的对立关系是弱势群体和权力阶层的对抗，因此，S1对应的义素是弱势群体，S2对应的义素是权力阶层，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或反义关系，且这种对立是价值维度上的对立或反义关系，因此铺设了符号矩阵的基本语义轴。与此同时，按照行动元模型，主体对客体的欲求关系一定意义上对应于弱势群体对于物质利益的诉求行为。如果说“主体”是弱势群体，那“客体”所对应的行动元必然是物质利益，即 $\overline{S1}$ 对应的义素是物质利益。至此，在符号矩阵结构中，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确立S1、S2、 $\overline{S1}$ 三个义素的矩阵位置，那 $\overline{S2}$ 如何确立？

按照修订后的符号矩阵的释义系统， $\overline{S2}$ 所对应的行动元应该是“辅助者”，且 $\overline{S2}$ 与权力阶层（S2）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关系，即二者是整体叙事冲突的重要构成内容。基于此， $\overline{S2}$ 所对应的义素只能是图像符号。一方面，表演目的就是对视觉图像的生产，进而“以图像的方式”进行社会抗争，因此图像符号（ $\overline{S2}$ ）是弱势群体（S1）开展维权行为的工具功能，因而扮演着“辅助者”的行动元角色，并且在矩阵关系上属于蕴涵关系；另一方面，权力阶层真正惧怕的并不是弱势群体的街头表演本身，而是其表演行为的视觉化呈现及其集聚的舆论压力。因此，权力阶层（S2）和图像符号（ $\overline{S2}$ ）之间是一种明显的矛盾关系，即权力阶层（S2）之所以最终会正视弱势群体（S1）的物质利益（ $\overline{S1}$ ），根本上是因为弱势群体（S1）的辅助者——图像符号（ $\overline{S2}$ ）的在场。由此可见，在符号

矩阵中， $\overline{S2}$ 实际上是抗争剧目中举足轻重的图像符号。

显然，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符号矩阵中S1、S2、 $\overline{S1}$ 、 $\overline{S2}$ 四个义素分别对应的叙事要素是弱势群体、权力阶层、物质利益、图像符号，且彼此之间存在或反义、或矛盾、或蕴涵的结构关系。四个要素之间的符号矩阵相对清晰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基本叙事结构（见图3）。在由弱势群体（S1）、权力阶层（S2）、物质利益（ $\overline{S1}$ ）、图像符号（ $\overline{S2}$ ）所搭建的矩阵结构中，两两之间共存在六种要素范畴和关系形态。接下来我们以“农民工苗翠花模仿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这一具体的抗争事件为切入点，从六种关系维度来认识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核心叙事要素及其结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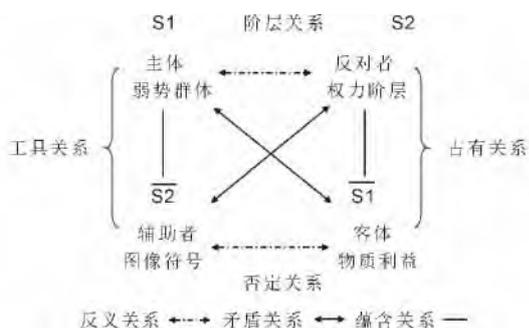


图3 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矩阵

第一，弱势群体（S1）和权力阶层（S2）构成了矩阵的核心语义轴，二者之间是一种阶层关系。这种关系是反义的，且根本上体现为价值上的对立。由于巨额工程款被拖欠，在多次讨薪失败后，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工苗翠花进入抗争表演实践中。可见，在农民工（弱势群体）的讨薪实践中，天津汉沽殡葬管理所（权力阶层）无疑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弱势群体和权力阶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铺设了表演式抗争的剧目逻辑和基本底色。

第二，权力阶层（S2）和物质利益（ $\overline{S1}$ ）之间是一种占有关系。正因为工程款（物质利益）被权力阶层违规占有，农民工的讨薪行为在道义上取得了极大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这种占有关系揭示了转型中国法制文明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足，同时也决定了社会抗争的逻辑过程，即农民工必须克服权力阶层的压制和阻挠才能艰难地拿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而社会正义话语正是在这种占有关系中被悄无声息地生产出来。

第三，弱势群体（S1）和物质利益（ $\overline{S1}$ ）之

间是一种间离关系。按照行动元模型的基本假设，整个叙事围绕“主体”（农民工）对“客体”（工程款）的欲求关系推进的。农民工是行动者，工程款是行动目标，二者搭建了抗争政治的行动框架。工程款原本是农民工的“应得之物”，然而权力却强行改写了工程款的社会属性，使其逐渐脱离了其原始的语义轴（农民工—工程款），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滑向了另一个语义轴（权力阶层—工程款）。两个语义轴之间的矛盾、冲突、异化状态微妙而深刻地折射出转型中国的阶层矛盾。

第四，弱势群体（S1）和图像符号（ $\overline{S2}$ ）之间是一种工具关系。在一切抗争行为中，弱势群体都会积极地寻找自己的阶级同盟和抗争工具，也就是“辅助者”。在充分评估转型中国的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之后，农民工敏锐地发现了另一种替代性的“辅助者”——讨薪视频（图像符号）。由于讨薪视频具备强大的情感动员能量，表演的目的并不是传统的线下抗争，而是通过制造“图像事件”来激活线上空间的公共讨论与社会抗争。

第五，图像符号（ $\overline{S2}$ ）和权力阶层（S2）之间是一种直接的抗争关系。权力阶层惧怕的并不是“发布会”现场的表演行为，而是对这种表演行为的媒介化表征，以及经由视觉化表征所集聚的强大的社会动员之“势”。正因为讨薪视频（图像符号）的“出场”，线上空间的集体情感（collective emotion）被极大地激活了，农民工因此获得了一个强大的“辅助者”。当线下的抗争表演最终转向了媒介化表征的图像符号，表演式抗争清晰地呈现了“以势抗争”实践中“势”的生产与运作机制。

第六，图像符号（ $\overline{S2}$ ）和物质利益（ $\overline{S1}$ ）之间是一种否定关系，二者之间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拖欠工程款（物质利益）这一社会事实，讨薪视频就不会被符号化，<sup>④</sup>即不会成为一个推动叙事情节的行动元；与此同时，讨薪视频一旦被符号化，我们便可以清晰地发现附加在工程款（物质利益）之上的社会属性和剥夺关系。简言之，没有违规拖欠的工程款，就不存在被符号化的讨薪视频，而如果讨薪视频没有被符号化，则不存在经由工程款剥夺问题而引发的公共议题（讨薪议题）。

### 三、表演式抗争的行动逻辑与符号矩阵

剧目结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要素关系层面，

还应该拓展到对事件演进的过程分析。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虽然清晰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要素关系，但却无法在历时意义上呈现事件发展的行动过程。其实，考察表演式抗争的行动过程，必须将其置于转型中国具体的政治机会结构中进行审视。一方面，弱势群体之所以采取“表演”这种“四两拨千斤”的抗争剧目而非群体性事件行动方式，根本上是基于对当前政治语境和话语空间的充分评估与研判；另一方面，之所以存在弱势群体的抗争实践，主体上是因为原本属于自己的物质利益被权力压制或剥夺，而这又触及到深层的法制文明与社会正义问题。综合来看，表演式抗争的缘起是意识形态问题，落点也是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对一种公平的、正义的政权结构的微弱呼唤。换言之，在表演式抗争事件中，真正推动“情节发展”的叙事动力或引擎装置是意识形态。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暗中作用”，表演式抗争既不会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也不会以“表演”这种极具底层智慧和话语策略的剧目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探究表演式抗争的剧目背景和行动过程，离不开对意识形态这一“隐性变量”的深入剖析。遗憾的是，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触及到的是一种要素关系，且这些要素都是显性的行动主体，尤其体现为文本叙事结构中的人物关系或主体关系。<sup>⑥</sup>也就是说，如果从传统的符号矩阵出发，所揭示的仅仅是一些表层的要素范畴和要素关系，很难真正触及到叙事深层的动力系统和意识形态语言。鉴于此，为了相对清晰地揭示表演式抗争剧目的行动过程，我们有必要将其置于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语境中，以此接近表演式抗争叙事的行动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机制。

### 1. 意识形态批评与“詹姆斯式”符号矩阵

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on)在充分借鉴了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型的基础上，对符号矩阵进行了必要的改造，提出了“詹姆斯式”符号矩阵，并将其视为一种“是对所有的作品都成立的象征性模式”。<sup>[9]</sup>(P122)詹姆斯在矩阵中预设的对立关系是由“价值”和“行动”构成的语义轴。相应地，S1、S2、S1、S2四个义素分别被替换为价值、行动、非价值、非行动，四个要素之间依然遵循符号矩阵关系中的反义、矛盾和蕴涵关系。如前所述，符号矩阵中居于核心范畴的关系是由S1和S2构成的对立或反义关系，其他要素及关系形态都是围绕这一关系结构自

行推演成的。詹姆斯的努力显然试图对S1和S2进行直接“赋值”，也就是从一种认知框架中来接近“价值”与“行动”的对立本质——“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sup>[9]</sup>(P115)可见，“价值”与“行动”这一语义范畴的出场和确立，一方面铺设了主体的行动方向与目标，另一方面也预设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施动关系。在詹姆斯看来，传统的符号矩阵未能揭示要素之间的动力系统，而“价值”与“行动”的确立则揭示了叙事推进的施动机制和逻辑关系，即叙事话语中的要素关系既离不开“价值”层面的作用和冲突分析，也离不开“行动”层面的过程和结果分析。因此，“价值”与“行动”铺设了一种普遍的叙事分析框架，二者之间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反义或对立关系。正如詹姆斯所说：“行动和价值的对立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矛盾，心理学上的‘困境’，逻辑上的自相矛盾。”<sup>[9]</sup>(P123)詹姆斯进一步指出，行动和价值的对立并非简单的意义对立，而是一种基础性的、本体性的、结构性的对立系统，因为这种对立系统能够深刻地揭示事件发展和任务推进的底层规则，且“我们所有的存在都是以这种对立为组织方式的”，因而基于“价值”和“行动”所组建的矩阵便是“一个本体论的矩形”。<sup>[9]</sup>(PP. 122—123)显然，经由詹姆斯的“改造”，符号矩阵被赋予了一种新的释义系统：“价值是超验的，而行动却又是属于这物质世界的，我们的使命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力求解决这个世界里解决不了的问题。”<sup>[9]</sup>(P123)

不同于“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侧重对四个要素的识别及其关系分析，“詹姆斯式”符号矩阵则立足于价值、行动、非价值、非行动所勾勒的基础矩阵模块，强调对叙事文本中“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这四对关系范畴的识别与分析。自从1985年来华讲学之后，“詹姆斯式”符号矩阵迅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纷纷借助经由詹姆斯改造之后的符号矩阵开展文学作品的叙事分析。<sup>[10]</sup>(P329)不得不说，在“詹姆斯式”符号矩阵分析案例中，绝大部分研究依然探讨的是人物关系，也就是识别并确认“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种关系范畴中对应的具体人物，从而揭示相关人物的价值属性和行动属性。换言之，“詹姆斯式”符号矩阵在对

人物属性的认知和判断上，确立了两个基本坐标，分别用“价值”和“行动”两个参照坐标来确定主体的特征、形象和类型：“价值坐标”强调个体是否拥护某种正面的价值观，“行动坐标”强调个体是否在努力朝着矛盾或问题解决的方向行动。当个体被置于由“价值”和“行动”所勾勒的坐标框架中，相应地便产生了四种类型的人物形象，也就是“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对关系范畴分别对应的人物形象。詹姆斯将这种分析结构推向了一个很高的结构主义位置，认为其是所有作品普遍共享的一种分析结构，并直言其是一种“存在本身的结构”。<sup>[9]</sup> (P122)

詹姆斯特别指出，这一矩阵分析结构不仅可以勾勒文本层面的叙事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一种通往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模型。因为在对“价值”和“行动”所建构的二项对立范畴中，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可阻挡地进入了意识形态批评范畴。什么样的价值是正面的，是值得拥护的？什么样的行动又是合法的，是被授权的？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时，实际上正是在尝试剖析一个时代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召唤和规约机制。换言之，正是在对“价值”和“行动”的深度追问和批判中，我们其实已经在思考“如何建立个体与世界的想象性关系”，而这难道不正是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批评所提出的那个经典命题吗？可见，在“价值”和“行动”所铺设的“詹姆斯式”符号矩阵中，当我们对“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对关系范畴进行识别和判断时，不单单是对文本叙事的结构主义呈现，其实已经跨上了意识形态的批评之路。詹姆斯将这一矩阵分析模型视为“很有趣的一种探讨意识形态的方法”，“一旦你有了两项对立的系统，你便可以确切地知道两件事：这个矛盾永远无法解决；而且你正处于意识形态之中，因此我把《吉姆爷》中的矩形看成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意识形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诊断。”<sup>[9]</sup> (PP. 123—124) 其实，“詹姆斯式”符号矩阵最为著名的是他对《吉姆爷》的矩阵分析，“吉姆爷”、“朝香客”、“座椅上的人”和“冒险家”之所以分别对应于“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和“非行动/价值”四种关系范畴，因为这一结构“正是西方对于自身的看法，因此属于意识形态，是一种神话，西

方关于自己的神话”。<sup>[9]</sup> (P124) 由此可见，“詹姆斯式”符号矩阵不仅意味着一种关于文本叙事的分析结构，更是通往意识形态批评的认识工具和分析模型。透过这一矩阵结构，我们可以抵达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及其规约下的叙事系统。正因为“詹姆斯式”符号矩阵对意识形态的特别“关照”，我们可以借助这一分析模型深刻地把握转型中国的表演式抗争叙事及其深层的意识形态运行机制。换言之，如果我们把表演式抗争事件视为一个文本，通过对文本叙事系统的“詹姆斯式分析”，便可以理解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及其不寻常的甚至耐人寻味的化解之“道”。

其实，在“詹姆斯式”符号矩阵的分析框架中，“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不单单可以确立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同时也意味着四种话语范畴，具有开展情节分析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目前，符号矩阵主要运用于叙事分析中的人物关系研究，对于叙事情节的分析却鲜有关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其实，“价值”与“行动”的对立不仅预设了叙事进程中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也预设了个体行为的认知框架和意义系统，这无疑有助于我们从话语的维度来把握叙事推进的情节与戏剧性内涵。比如，“价值/行动”本身就铺设了一种话语形态，矛盾之所以最终得以解决，往往依靠的是“价值”和“行动”的结合，这种“结合”既可以对应于人物形象认知层面的“英雄”人物，也可以对应于通往问题解决的英雄行为。“英雄”最终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便构成了叙事过程中的情节内容。与此类似，“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也铺设了相应的叙事话语，并且对应于不同的文本情节和主体行为。因此，与“格雷马斯式”符号矩阵不同，“詹姆斯式”符号矩阵不仅在人物形象分析上另辟蹊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通往叙事情节和行动过程的认知模型和分析工具。

## 2. 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与行动逻辑

如果将表演式抗争事件视为一个行动中的叙事文本，那我们便可以借助“詹姆斯式”符号矩阵来把握弱势群体抗争的剧目情节及其构成。回到表演式抗争的具体文本语境，首先需要对“价值”和“行动”这一语义轴进行清晰的意涵界定。弱势群体的抗争诉求非常朴素，那就是讨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物质利益。在价值认知上，弱势群体征用了威廉

·甘姆森(William A. Gamson)提出的社会抗争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框架形态——正义框架,也就是将自己承受的痛苦和苦难界定为一种被他人不道德行为所致的“不幸”。<sup>[1]</sup>(P32)当正义框架被激活并进入公共场域,我们才能判断什么行为是正义的,什么又是不道义的,这无疑决定了公共场域中的争议构成与话语特征;在行动认知上,弱势群体并没有诉诸传统的群体性事件的抗争方式,而是对转型中国的政治机会结构进行充分的评估和判断,进而采用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政权与斗争剧目》中特别推崇的那种“能让当地人领神会的地方性风格(idioms)”,<sup>[2]</sup>(P63)也就是“四两拨千斤式”的戏剧表演式抗争剧目。相对于其他的行动剧目,表演式抗争剧目是基于当下政治机会结构的有效表达,因而意味着一种通往问题解决的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案。基于此,我们可以发现,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价值”就是社会正义,“行动”就是表演式抗争,与此对应的“非价值”就是对社会正义的漠视与抗拒,“非行动”就是有悖于问题解决的行动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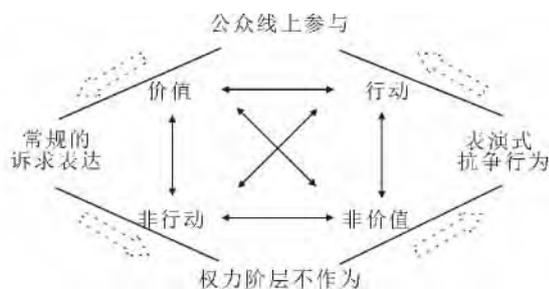


图4 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矩阵

明确了“价值”和“行动”这一语义轴的话语框架及其意涵系统,我们便可以借助“詹姆逊式”符号矩阵来勾勒出表演式抗争的剧目情节(见图4)。第一,“价值/行动”对应的情节内容是“公众线上参与”。表演式抗争之所以能够引发公众的普遍关注,离不开对公众的正义框架的激活与生产。公众通过各种媒介途径参与讨论,并形成舆论压力,促使权力阶层正视并回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这种行为无疑体现了价值和行动的结合;第二,“行动/非价值”对应的情节内容是“表演式抗争行为”。在行动维度上,弱势群体的表演行为体现了一定的表达智慧,尤其是对视觉化的图像话语的生产,促使了媒介事件的建构与传播,因此体现了强大的“行动”意义。在价值维度上,表演的剧目和目的并非指向明确的正义诉求,主要是强调对

媒介事件建构所需的戏剧性话语的生产,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说的将事情“搞大”。由于偏离了明确的正义诉求,表演行为是“非价值”的。因此,表演式抗争行为在语义结构上体现了“行动/非价值”这一冲突范畴;第三,“非价值/非行动”对应的情节内容是“权力阶层不作为”。面对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权力阶层最初都是采取搪塞、推诿、狡辩、回避和压制的方式,可以说这种行为一方面并未体现出一定的正义立场或道义原则,另一方面也没有朝着问题解决的方向迈进,因此这种“不作为”既是“非价值”的,也是“非行动”的。正因为权力阶层在价值和行动两个层面的消极回应,才出现了“表演式抗争”这种充满智慧的抗争剧目;第四,“价值/非行动”对应的情节内容是“常规的诉求表达”。不得不说,表演式抗争是一种无奈之举。早在抗争表演之前,弱势群体已经多次向权力阶层表达了自身的利益诉求,但结果都无功而返(如农民工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讨薪之前已经多次催要工程款,长沙市民也是在多次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才给政府送去“踢皮球先进单位”锦旗,重庆男子在商场门前为手机设立“灵堂”之前也是多次与商家沟通维修,河南七旬老人之所以在庙里供奉县长像也是因为多次讨要医药费的失败)。这些“常规的诉求表达”最终都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也迫使他们去探寻一种更有智慧的抗争剧目——表演式抗争。因此,“传统的诉求表达”在价值立场上是明确的,体现了对自身利益的充分识别和正当诉求,但在行动上却低估或者忽视了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规约和政治机会结构,这也直接酿成了其失败的宿命。基于此,我们将“价值/非行动”的情节内容理解为“传统的诉求表达”。总之,当我们立足于“詹姆逊式”符号矩阵这一分析模型,表演式抗争实践的情节内容便在“价值/行动”、“行动/非价值”、“非价值/非行动”、“非行动/价值”四种对立的语义轴上逐渐呈现和演绎,且分别对应于情节内容是“公众线上参与”、“表演式抗争行为”、“权力阶层不作为”和“传统的诉求表达”。

其实,“詹姆逊式”符号矩阵的意义不单单体现为对表演式抗争叙事的情节内容与构成分析,而且意味着一种通往情节过程分析的结构框架和符号学模型。如果我们以“价值/非行动”作为认知起点,然后逆时针方向依次审视“非价值/非行动”、“行动/非价值”、“价值/行动”所对应的情节内容,

那这些情节内容之间不仅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而且在时间意义上存在一定的历时关系和演进逻辑，而这一认知过程恰恰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情节发展脉络。基于“詹姆逊式”符号矩阵，我们不妨简单描述一下表演式抗争的演变轨迹。首先，弱势群体向权力阶层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一般会采取两种常规的诉求方式：要么是传统的、直接的、日常的“催要方式”，要么是诸如自焚、上访、集会、示威等对抗性的“冲突方式”。但不得不说，这两种方式要么因为平淡无奇的剧目特征而被权力阶层公然漠视，要么因为其强烈的对抗性和敏感性而遭到一种结构性的压制；其次，面对弱势群体正常的利益诉求，表演式抗争实践的权力阶层往往会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即一方面在“价值”上拒绝弱势群体的正义诉求，另一方面在“行动”上回避或拒绝执行原本签订的合同内容；再次，当“权力阶层不作为”之际，弱势群体开始琢磨并思考一种策略性的抗争剧目，最终选择的是“表演式抗争行为”；最后，表演的目的就是制造图像事件，通过图像的方式开展社会动员，从而激活“公众线上参与”，以此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最终迫使权力阶层正视并回应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可见，“詹姆逊式”符号矩阵（见图4）不仅从对立性的语义关系上揭示了表演式抗争的情节内容，同时也在历时维度上揭示了情节变化过程，也就是情节内容之间的演化系统及其逻辑。简言之，“常规的诉求表达→权力阶层不作为→表演式抗争行为→公众线上参与”铺设了表演式抗争事件的发展轨迹和演变链条，与其相应的底层语言及其解释系统则指向“价值/非行动→非价值/非行动→行动/非价值→价值/行动”的演变过程。

#### 四、作为“图像事件”的表演式抗争： 一个结构主义确认

本文将表演式抗争的本质定性为图像事件，根本上是强调图像在整个社会动员和叙事系统中的核心作用，即借助视觉化的符码系统作用于人们的感性认知，从而达到“视觉动员”（visual mobilization）的政治目的。视觉动员也即视觉化的社会动员，侧重视觉元素和视觉经验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符号形态参与并推动公共议题建构的媒介实践。在新媒体语境下，主体互动及其符号实践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趋势，<sup>[12]</sup>而图像成为公共场域中最

具有流动性的一种碎片文本形态，在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的对话实践中发挥着微妙而神奇的勾连作用。在视觉文化时代，社会争议生产更多地依赖于“戏剧性的、易溶性的、视觉性的瞬间”，<sup>[13]</sup>图像因此超越了文字而占据了话语构建的核心位置。<sup>[14]</sup>约翰·德利卡斯（John W. Delicath）和凯文·迪卢卡（Kevin Michael Deluca）将经由图像符号引擎、驱动并主导的媒介事件称为“图像事件”，以此强调图像对于公共议题构建与公共话语生成的主体地位。<sup>[15]</sup>（PP. 315—333）因此，所谓图像事件，主要指通过图像化的表征、形式和途径实现社会争议建构与公共议题生产的符号实践。当图像进入表演式抗争文本的深层结构，并且作为一种生产性的符号元素参与剧目建构与社会动员，“视觉抗争”（visual resistance）便意味着一种逼真的抗争观念。

在表演式抗争事件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之所以采用“戏剧表演”而非“催要方式”和“冲突方式”，根本上是因为“戏剧表演”传递了一种新的抗争形式和剧目观念，其落点并不是对利益诉求的直接表达，而是强调对互联网传播场域中图像符号的生产实践，或者说表演的目的和落点就是为了制造图像。权力阶层惧怕的并不是表演本身，而是图像化的表演场景。当表演行为经由媒介化表征而成为具体的图像文本，那视觉动员便成为一个逼真的社会抗争命题。什么样的图像能够激活公众注意力，什么样的图像能够产生最大的劝服效果，这本质上涉及到图像本身的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s）问题。在剧目形式上，弱势群体的表演之所以是滑稽的、幽默的、诙谐的，根本上是因为这些场景经由视觉化再现之后，有效地吻合了互联网传播场域中的消费逻辑、认知逻辑和注意力逻辑。由此可见，表演式抗争的本质是图像事件，主要是强调图像之于整个事件生成与演进的核心地位与动力机制。

如果说图像事件强调图像文本在抗争过程中的主体功能和意义，那我们如何在学理上识别图像在表演式抗争事件中的核心“位置”，又如何证实图像对于整个事件推进的动力作用，前文所述的符号矩阵无疑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理论认知框架。第一，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模型中（见图2），图像符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动元，处于行动元模型中的“辅助者”位置。正如行动元模型所揭示的要素构成与关系结构，作为“辅助者”的图像致力于协

助“主体”（弱势群体）完成对“客体”（物质利益）的追讨行动。如果离开图像的在场，“主体”要想克服“反对者”（权力阶层）的重重阻挠，这无异于天方夜谭。可见，行动元模型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结构主义框架，其功能有助于我们发现并识别图像在整个行动/事件的角色和功能；第二，在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中（见图3），图像符号处于矩阵中的一个义素位置（ $\overline{S2}$ ），并与其他义素一起构成了一种稳定的符号结构和认知模型。正如前文所揭示的，图像符号（ $\overline{S2}$ ）与权力阶层（ $S2$ ）之间是一种矛盾关系，与弱势群体（ $S1$ ）之间是一种蕴含关系，与物质利益（ $\overline{S1}$ ）之间是一种否定关系。正因为图像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符号义素进入矩阵结构，并且有效地诠释了表演式抗争中的要素关系，符号矩阵无疑在结构主义叙事维度上确认了图像在整个事件中的核心地位；第三，在“詹姆斯式”符号矩阵中（见图4），“行动/非价值”和“价值/非行动”关系范畴分别对应的情节内容是“表演式抗争行为”与“常规的诉求表达”，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漠视或拒绝了图像话语的在场，而后者目的就是制造图像，试图在视觉动员意义上间接地维护并争取权益，这足以体现出图像在矩阵中的特殊“位置”。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立足于表演式抗争的情节演变过程，从“行动/非价值”到“价值/行动”的积极转换，根本上是因为图像符号及其视觉动员的能动作用。正因为图像的在场，“表演式抗争行为”获得了普遍的社会关注，最终将事件演化并升级为公共场域中的“公众线上参与”，从而有效实现了“价值”与“行动”的有效对接。基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行动元模型、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以及詹姆斯的符号矩阵分别从三种不同的结构主义理论视角发现并确认了图像符号

在表演式抗争中的主体位置与动力作用。将表演式抗争定性为图像事件，显然是一种经得起理论推敲的学术判断。

本文从符号矩阵的理论视角思考表演式抗争，并不是机械地套用这一分析模式，而是因为符号矩阵提供了一种相对比较科学的分析结构。通过这一结构模型，我们可以抵达表演式抗争文本的要素关系、情节构成和行动框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在符号矩阵中，我们发现了图像，确认了图像的叙事“位置”，并且在一种理论模型中识别并证实了图像对于事件推进的动力机制。换言之，“图像事件”之所以是一个合法的概念表述和事件形态，符号矩阵不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结构，同时提供了一种有力的理论佐证，即我们可以在结构主义理论维度上确认“图像事件”这一概念本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进一步讲，图像事件在叙事学意义上存在一个普遍的、稳定的运行结构，而通往这一结构的底层语言和阐释系统是可以借助符号学方式进行把握的。当图像作为一个生产性的行动元要素进入表演式抗争的矩阵结构，那它便实现了线上空间与线下空间的有效对接和主体互动，进而制造了一幕“表演在线下，抗争在线上”的符码流动景观。可见，立足于符号矩阵所提供的诠释框架和分析模型，我们可以相对清晰地认识图像在表演式抗争实践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机制，尤其是图像符号参与“抗争性话语”（insurgent discourse）<sup>[4]</sup>（P59）生产以及“抗争性公共领域”（counter-public sphere）<sup>[16]</sup>（PP. 827 - 847）建构的符号学运作原理。简言之，表演式抗争本质上是一种“图像事件”，而底层抗争的符号学本质则体现为“视觉抗争”。

#### [注 释]

- ① 政治机会结构是社会抗争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所反映的是社会抗争发生的宏观语境。查尔斯·蒂利指出，政治机会结构包括权力集中程度、政权开放程度、权力稳定程度、信息管制程度、政权压制程度等。
- ② 之所以立足于符号矩阵思想，是因为符号矩阵所揭示的是一个语义方阵，整个方阵是围绕对立关系所建立起来的一套分析模型，而表演式抗争实践的底层语言同样是一套对立系统，且围绕对立系统铺设的一套抗争叙事，因此从符号矩阵思想去接近表演式抗争的剧目结构是一种合理的路径假设。同时，本文并不是机

械地套用符号矩阵，而是尝试对其进行批评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下文提及的一些深层理论问题。

- ③ 格雷马斯认为，如果将科学形式横轴上的单位（如具体的化学公式）改造并转化为符号学纵轴上的最小单位（如味觉中的特殊味道），即实现科学的“横组合轴”与符号学的“纵聚合轴”的关联，我们便可以游刃有余地调整甚至联通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的距离。
- ④ 所谓符号化，就是赋予事物以意义的行为，使其成为一个携带特定意义和指涉内容的表意符号。任何没有意义的事物，一旦经过符号化过程，就变成了符号。

⑤ 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得到国内学者的特别青睐，纷纷借助这一模型进行叙事分析，然而大多揭示的依然是文本中的人物关系。1985年，弗雷德里克·詹姆斯（Fredric Jameson）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第一次将格

雷马斯的符号矩阵介绍到中国，并运用矩阵理论分析了《聊斋志异·鸬鹚》，所呈现的依然是文本中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

[参考文献]

- [1] 黄振辉. 表演式抗争：景观、挑战与发生机理——基于珠江三角洲典型案例研究 [J]. 开放时代, 2011, (2).
- [2] [美] 查尔斯·蒂利. 政权与斗争剧目 [M]. 胡位钧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3] [美]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抗争政治 [M]. 李义中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0.
- [4] Cox, R.,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Sphere*, London: Sage, 2006.
- [5] [法] 格雷马斯.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上） [M]. 吴泓缈, 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 [6] [法] 格雷马斯. 论意义：符号学论文集（下） [M]. 吴泓缈, 冯学俊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 [7] [法] 格雷马斯. 结构语文学 [M]. 蒋梓骅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 [8] 钱翰, 黄秀端.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的旅行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2).
- [9]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M]. 唐小兵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 [10] 王一川. 中国形象诗学 [M].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 [11] Gamson, W. A.,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2] 刘涛. 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5, (5).
- [13] Jamieson, K. H., *Eloquence in an Electronic 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Speechmak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4] 刘涛. 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修辞视角 [J]. 当代传播, 2012, (2).
- [15] Delicath, J. W., & Deluca, K. M., *Image Events, the public sphere, and argumentative practice: The case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 groups*, *Argumentation*, 17 (3), 2003.
- [16] Dahlberg, L., *Rethinking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cyberpublic: From consensus to contest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9 (5), 2007.

## Visual Resistance: The Repertoires Structure and Semiotic Matrix of Performing Resistance

LIU Tao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PRC)

[Abstract] Of various resistanc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he performing resistance has turned into a new contentious repertoire. Given the event context of performing resistance, the semiotic matrix has offered a convincing analytic mode based on narratology. That means the intricate elements, the story composition and the act framework of performing resistance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the context extracted from semiotic matrix, which has discovered and confirmed the actant role and relevant functions of image during social events, and verified the impetus of images for events' acceleration i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ism framework. Therefore, performing resistance is essentially a kind of image events, while the underclass resistance with semiotic connotation presents to be visual resistance.

[Key words] performing resistance; visual resistance; repertoire; semiotic matrix; image events

(责任编辑 胡晓春/校对 谷雨)